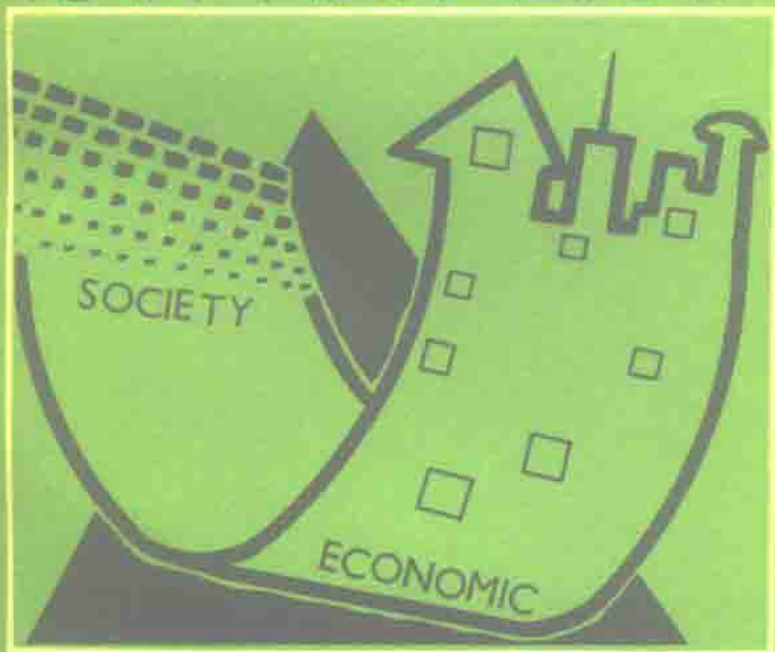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经济与社会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尼尔·斯梅尔瑟 著
刘进 林午 李新 吴子 译 林地 校



华夏出版社

经济与社会

[美] 塔尔科特·帕森斯 尼尔·斯梅尔瑟 著
刘进 林午 李新 吴予 译 林地 校

责任编辑：张静颐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李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波

ECONOMY AND SOCIETY
A Stud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
by
Talcott Parsons & Nell J. Smelser
Routledge & Rengan Paul Ltd., 1984.

经济与社会
——对经济与社会的理论统一的研究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
尼尔·斯梅尔瑟
刘进 林午 李新 吴予 译
林地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

890×1168毫米32开本 9.5印张 220千字 插页2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ISBN7-80053-592-4/F·029

定价：5.40元

译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学界的学术气氛异常活跃，陆续形成了几大理论体系。从属于“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其中影响颇为广泛而持久的一个重要分支。

“结构功能主义”首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范畴，结构表示着系统各成分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或顺序，它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系统的各个层次中，而同时又各具特殊的属性。功能则是结构内部各种成分与外部情境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帕森斯继承韦伯的传统，把社会行动作为分析一切社会系统发展演变的出发点，他认为所有个人行动均以主观选择为基础，而且社会系统是一种标准规则、价值和信念的综合体，只有从其发展演变中的运作结构与功能规范的角度，才能最好地理解这些系统。

帕森斯创立了“模式变量”的概念，用于概括分析行动者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在行为定向方面可能作出的选择。这五对由对立极值构成的模式变量是：(1) 涉及情绪方面的“情感投注性”与“情感无涉性”；(2) 涉及义务方面的“扩散性”与“专一性”；(3) 涉及规范方面的“特殊性”与“普遍性”；(4) 涉及地位方面的“先赋性”与“自致性”；(5) 涉及利益方面的“无利性”与“自利性”。帕森斯认为，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情感投注性、扩散性、特殊性、先赋性和无利性等因素将越来越衰弱，而情感无涉性、专一性、普遍性、自致性和自利性则将越来越强化。进而言之，前五者构成行动中

的“传统性”定向因素；后五者构成“现代性”定向因素。

此外，帕森斯还在系统论、控制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创立了著名的 AGIL 行动系统理论的框架。他提出任何社会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必须要满足以下四种功能需要：(1)适应功能，即系统必须有从外部环境摄取生存资源并分配给各个部分；(2)目标实现功能，即系统必须具有一定目标，并且能够调动资源以实现其目标和定出优先次序；(3)统一功能，即系统必须把各组成部分协调配合成一个功能总体；(4)模式维持功能，即系统的过程必须按一定规范连续地进行，并且能够缓和其内部的紧张状态。而执行这四项功能的系统则分别为行动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其中的社会系统又由经济、社区、价值和政治子系统组成。总之，一种功能存在于多个系统，而一个系统又涵括多种功能。帕森斯认为，从功能需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进化的标准表现为：系统分化程度的提高、适应能力的增强以及包容和价值一般化层次的上升。

本书是帕森斯的代表作之一，他在本书中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以及“经济学理论是一般社会系统理论和一般行动理论的一个特例”为中心命题，描述了经济及其它同类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界限关系，并对经济系统的主要结构单位进行了一般化概括。更重要的是，他系统地论述了系统的稳定性、整合性与最大效果的条件，从而证明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密切联系，并指出社会科学与各个学科理论之间的相互结合将为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展示广阔的前景。

我国近几年来进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质上就是根据我国国情不断改善和发展经济生产的社会环境。我们认为帕森斯的思想体系可以为我国当前的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 早年在阿默斯特大学主修生物学, 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 1927年在海得堡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以后在哈佛大学执教42年。帕森斯于30年代开始将韦伯、杜尔克姆和帕雷托的著作介绍给美国社会学界, 后于40年代末首次提出“结构功能主义”学说或“社会行动与系统理论”。他的理论思想对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特别是社会学, 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他本人曾经担任美国最高学术机构文理科学院的院长, 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也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尼尔·斯梅尔瑟亦系著名社会学家, 早年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主修社会学, 后获罗得斯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奖学金, 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 现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

林 地

1988年5月于北京

序 言

本书是为说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耦合而作。我们认为学术界的传统和当前的习惯作法均强调研究这两个学科之间分离的程度，从而断然掩盖了它们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密切联系。经济学和社会学学术界均须对这种联系引起注意。

我们写此书是为纪念近代社会科学史的两伟人，他们各自属于上述两个学科中的一个。马歇尔和韦伯的著作，如结合在一起研究，则揭示出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但在他们之后，一直没有人对这两个学科进行过比较。帕雷托也曾引人注目地试图以一种不太相同的观点阐述这种理论耦合，其观点对我们的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从瓦尔拉斯那里吸收并予以发展的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一度似乎就要与一般社会系统理论融为一体了。但是，这些人的主张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我们认为在这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理论不但没有得到发展，而且是倒退了。

为什么如此大有希望的开端没有带来进一步的发展呢？在经济学方面，我们可以指出三个障碍。首先，经济学家们都愈来愈关注经济学理论的技术手段所展示的巨大潜力（马歇尔本人就曾对此做出过重要贡献）。其次，那些涉及公共政策的紧迫问题在要求经济学家们立即提出解决办法。要在这种压力下去探讨与相邻学科的理论联系，看来是不甚妥当的。最后，经济学家们认为社会学本身的基本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没能提出什么有用的见

解。实际上,大多数最优秀的社会学理论都是在最近才被翻译成英文的。

从社会学的传统来看,那种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一直在学术界扩散弥漫的微妙局面所持的一贯反感,是一个主要的隔离因素。进一步说,经济学家所引用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目的来说,似乎都不适用。看来,社会学必须要先找到其自身的位置,然后才能吸收其姐妹学科之所长。

以美国为例,人们对于夭折了的制度化运动所产生的幻灭情绪毫无疑问地拉大了两个学科之间的距离。这种(我们认为)不太完善的社会学理论同对于经济学及几乎其它所有理论所持的消极态度相结合,致使这场运动成为对学科之间关系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中埋藏的一个不良的楔子。在英国,人们对于除原始部落外的社会学研究所持的消极态度也起了相应的作用,而经济学家本身对于原始部落是历来不感兴趣的。或许,当时两国普遍存在的那种对于高度概括性理论一般均予怀疑的气氛也起了一定作用。

无论这种分离状况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认为将来这两个学科都会对他们之间的那种尚未确定的关系重新产生兴趣。为此,我们愿献上此书。我们希望我们的论述可以引出许多内容翔实的批评。当前,没有什么精通社会学理论的人具备经济学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懂得许多社会学知识。我们还希望严厉的批评并非来自上述不幸的局面。

根据情这种况,我们必须要引用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经济学。除那些为数不多的精通两种技术理论的人以外,这些篇章对于其他人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只能这样来作些解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如以宽容和认真的态度研读这些生疏的资料,就都可能受益,获得他们在各自学科领域之内无法得以认识的真相。

本书的思想始于1953年秋,当时本书资深的作者正应邀在剑

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题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统一”的演讲。在那次演讲的许多年之前，他一直在研究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正如《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及其它各种论文所记述的那样。不过，他在当时转向了其它的领域。这一邀请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拾旧趣的大好时机，于是他自己又临时熟悉起经济学领域的许多重大发展，并且把它们与其自己领域的变化进行了比较。但是，由于这次准备演讲的时间不太充裕，所以当时（1953年11月）发表的那些演讲并不完善，对于问题的论述也不充分。显然，那些最早版本的文章是不足取的。

在那次马歇尔讲座举办之际，本书较年轻的作者正以罗得斯哲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最高年级重点攻读经济学。在此之前，他曾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学生。我们很快就建立了联系，并于1953—1954学年期间在欧洲进行了多次讨论。1954—1955学年，我们俩都回到了哈佛。于是，那些讨论进而发展到合作，而这本书则是成果。

本书的前三章，从大体上看，概述了马歇尔讲座三次演讲的内容。不过，那些演讲所使用词语实际上并未再现。书中所用的素材完全是根据许多最新的理论发展而重新组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是那些演讲根本没有涉及过的。第四章所论述的经济分析的技术方法，本书资深的作者在发表演讲时对其可以说是完全不理解。第五章，虽然从整体上看包含的社会学内容多于经济学，但那些演讲还是有意删去它们，因为当时文章的篇幅有限，而且作者也缺乏对于可能引起批评去进行论争的信心。我们增添了上述篇章，因为原先是孤军作战，而现在则增加了生力军，并且两年多的合作也使我们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本书资深的作者愿籍此机会对剑桥大学学术界在马歇尔讲座举办之际，以及在他1953至1954年间担任社会理论客座教授之

际，给予他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尤其对主持演讲的奥斯丁·罗宾逊教授（Austin Robinson）和当初协助整理手稿，使之更便于批评分析的现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哈利·约翰逊先生（Harry Johnson），要特别指出予以感谢。迈耶·福蒂斯教授（Meyer Fortes）、波斯坦教授（M. Postan）、理查德·斯通博士（Richard Stone）、布赖恩特·金先生（Bryant King）和诺埃尔·安楠先生（Noel Annan）都在某种程度上对作者有过相当积极的影响。至于其他英国同事，雷蒙德·弗斯教授（Raymond Firth）也曾协助评论过演讲的手稿，并且对演讲的题目提出建议，后来本书也采用了这一题目。^① 现在虽然有点晚，资深的作者认为还是应当为自己很早以前在剑桥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他于1930年曾在那里学习过马歇尔的社会学思想，并据此撰写了两篇文章，载于《经济学季刊》，后来又编入《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第四章。现已辞世的马歇尔夫人在当时也曾对作者特别关心，并予以过热情帮助。

本书较年轻的作者对哈佛大学的威廉·莫法特先生（William R. Moffat）对马歇尔讲座演讲所作的耐心详尽的批评意见表示感谢，他对凯恩斯的定界过程观点所作的分析，曾启示作者对研究素材进行了全面修订，本书的第二章采用了这些素材。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兰·恩索文先生（Allain Enthoven）通读了第四章中有关贸易周期的经济学资料，并建议删去了一些赘语。还应该感谢曾指导年轻作者学习两年经济学的剑桥马格达兰学院

① 我们认识到这个题目几乎是完全逐字翻译了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尽管本书从规模和综合性上与韦伯的著作不同，但我们仍希望它能跻身于这样一部著作的续之列。我们还在无意中使用了威尔伯特·穆尔（Wilbert Moore）在其杰出的小册子（达伯尔代丛书，1955年版）中用过的同样题目。不过，我们在决定题目之前对穆尔教授的作品毫无所动。

士沃斯威克先生(G·O·N·Worswick),他当时坚持要让作者精通经济学理论,并欢迎这位临时改行的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建议和解释。

1954—1955 学年期间,哈佛社会关系系研究生举办的有关职业类型分类问题的非正式星期讨论会对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记述理论发展有很大帮助。讨论会的出席者除两位作者外,还有克里斯廷·凯泽小姐(Christine Kayser)、罗伯特·艾弗里(Robert W·Avery)、杰西·皮茨(Jesse R·Pitts)和霍华德·罗斯巴勒(Howard E·Roseborough)先生,有一段时间还包括弗兰克·琼斯博士(Frank E·Jones)。至于社会学中的经济问题,皮茨先生和罗斯巴勒先生曾给予过相当多的帮助。在秋季学期,第二章中有关理论分析的框架已经形成,并在有关社会系统理论的研究生研讨会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后来,几位经济学家对手稿又进行了仔细阅读。我们特别感谢芝加哥大学的伯特·霍斯利兹教授(Bert F Hoselitz),他那非常透彻精辟的评论分析曾启发作者对文章作了很多修改。其他提供过很有帮助的批评意见的人有切斯特·巴纳德先生(Chester I. Barnard)、西北大学的艾尔弗雷德·康拉德博士(Alfred Conrad)、哈佛大学的詹姆斯·杜森贝利教授(James Duesenberry)、普林斯顿大学的马里恩·列维教授(Marion J. Levy)、哈佛大学的亨利·罗索夫斯基教授(Henry Posovsky)、麻省理工学院的罗斯托教授(W·W·Rostow)和福特基金会的弗兰西斯·萨顿先生(Francis X. Sutton)。这些批评者从几个方面对于同一主题所得出的相近结论,对于引导作者修改本书初稿颇有教益。不过,他们对于我们最终在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采纳了许多建议,但是也拒绝了一些建议,我们将对此承担完全的责任。

多琳丝·伯克霍尔德·萨克斯夫人(Dorinthe Burkholder Sacks)在安娜·康纳斯夫人(Anna Connors)的帮助之下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本书几次修改期间十分艰巨的文稿整理工作。

塔尔科特·帕森斯

尼尔·斯梅尔瑟

1956年1月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问题：当前的社会学理论和一些经济学的	
主要概念	(1)
第一节 问题	(1)
第二节 研究方案	(5)
第三节 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一些共性	(8)
第四节 成本问题	(27)
第五节 福利问题	(29)
第六节 方法注释：功能问题与模式变量的关系	(31)
第二章 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经济：其内部结构与	
外部界限	(37)
导 言	(37)
第一节 社会的功能分化	(43)
第二节 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界限	(47)
第三节 界限的双重互换	(63)
第四节 一些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界限的过程	(75)
第三章 经济的体制结构	(89)
导 言	(89)
第一节 合同：主要的经济制度	(91)
第二节 劳动力，职业和就业合同	(100)

第三节	财产、所有权和投资合同·····	(109)
第四节	要素的一般化概括和经济组织·····	(123)
第五节	市场的体制结构·····	(127)
第六节	经济价值和经济活动促动因素的制度化·····	(156)
第四章	社会环境中的经济过程 ·····	(165)
导言	·····	(165)
第一节	贸易周期的一些模型·····	(166)
第二节	经济的内部结构·····	(176)
第三节	经济内部的界限关系·····	(184)
第四节	再论贸易周期·····	(195)
第五节	消费函数·····	(197)
第六节	投资函数·····	(208)
第七节	关于时滞的说明·····	(216)
第五章	经济的增长和体制变化问题 ·····	(221)
第一节	变化的性质·····	(221)
第二节	经济增长模型·····	(224)
第三节	美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所有权同控制权 的分离·····	(226)
第四节	体制变化的模型·····	(229)
第五节	经济增长模型和体制变化过程·····	(246)
第六节	对一些历史与理论的透视·····	(255)
第六章	结论：经济学理论与一般社会系统理论 ·····	(265)
第一节	对上述分析的小结·····	(265)
第二节	结论·····	(275)
第三节	最后的说明·····	(277)
附录	参考书目 ·····	(280)

第一章 问题：当前的社会学理论和 一些经济学的主要概念

第一节 问 题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愿将这种观点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即使如此简单的概念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如何限定这个经济方面？还存在哪些其它的方面？它们同经济方面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在经济学文献中人们常会遇见这样的词语：“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用说还有“自然的”——它们曾经被用来特指社会生活的那些“非经济”方面。人们很少以认真的态度尝试为这些概念下严谨的定义。这些概念只是被当做一种标志，说明“经济”领域有其界限，并且在经济领域之外存在着一些事物。当然，其缺乏精确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探索经济领域之外的事物不是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

本书基于一些演讲，其听众主要为经济学家。许多人认为，向经济学家讲这些非经济的问题似乎是出格了，因为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毕竟被认为是一项道地的科学。我们愿意作一尝试来消除这种认识，并说明无论在理论或者实证的意义上海经济学都必须依靠其它社会科学，而其它社会科学也都要依靠经济学。

从理论的意义看，经济学家们非常同意经济学理论本身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体系，只有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这种理论才能够解

决一些实证问题。经济学家们以假设条件和参数限定这些条件，同时划定在其运用中应遵守的界限。然而，在某些分析中，经济学家相互之间就对适当的假设和参数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首先，我们希望说明这种分歧源于不同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界限概念的不同的偏好使用。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明这种假设条件及参数的含义远远超过了其经济意义，它们以一种具体的理论方式同社会系统理论的其它诸方面结为一体。如果确实如此，关于经济学理论界限的问题——该问题源于其抽象的特征——则可以比现在得到更具体的解答。

从实证的意义看，那种认为经济学理论是抽象理论体系的观点意味着必须要把经验现象看作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结果。根据这个论点，我们要解决下列几个问题：在不同类型的经验现象中哪种具体因素是重要的？假定经济事物和非经济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一致是一种实际状况，我们有没有可以对这些非经济因素进一步进行分化、分类和分析的理论方法？

有几个范例可能是恰当的，舒姆皮特（Schumpeter）和凯恩斯都曾致力于研究——当然，是从不同的方面——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问题。^①他们都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相对的稳定是可能实现的。但二人又都侧重于分析可能出现的不稳定的原因。我们感兴趣的问题首先是：他们的这些分析有否使用纯经济学以外的术语来给这些稳定和不稳定的条件赋予理论意义？可否对这种非经济的意义作出系统阐述，从而使经济学家在实证和理论上都有所借鉴？

^① 参阅 J. M. 凯恩斯的《雇佣、利益和货币的基本理论》，1936 年版，第 249 页，以及 J. A. 舒姆皮特的《经济发展的理论》。雷德弗斯·奥佩（Redvers Opie）译文，1934 年版。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孤立那些与经济有紧密关联的过程的非经济方面。例如，舒姆皮特集中于研究企业的革新，^①他强调它仅仅有一部分是经济过程，企业家不仅是体现经济合理性的经济人。^②企业家的一个化身是家庭“朝代”的想当然的缔造者，其声望远远超出了他的有生之年。凯恩斯曾以雇工和收入来分析不稳定性。为此，他使用了“货币工资的粘性”及“消费的边际倾向”^③等概念。根据有关社会系统其它方面的观点，这些概念具有何种地位？社会学家能如何评价其实证的确切性？他们能分析出那些非经济的内涵吗？

经济学家们曾经对一系列有关市场关系特点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过相当持久和稳定的分析。出于某些理论原因，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随着公司对产出和价格控制程度的范围不同而变化。在这个范围的终点分别是完全的自由市场和完全的垄断市场，而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存在着多种程度的不完善情况。^④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种市场的不完善情况不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也有所不同。消费品市场不同于劳动力市场，而这两者又都不同于资本市场。这些市场之所以在形态上不同，主要因为不同的市场将经济和社会的不同部门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从质上强化了各个市场条件的不同界限。

从另一个范例，我们可以注意到分析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间在侧重点上非常明确的不同之处。这种分歧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史学家所研究的是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中的某些参数对经济理论家来说至关重要，但这些参数又不能假定不为

① 参阅前引 J·A·舒姆皮特著作的 90—93 页。

② 原文为拉丁文：homo economicus。

③ 参阅前引 J·M·凯恩斯著作的第二、八、九、十九章。

④ 参阅斯蒂格勒 (G. J. Stigler)《价格理论》，1952 年修订版，第十二、十三章和张伯伦 (E. H. Chamberliu)的《垄断竞争理论》，1948 年 6 月版，第 204 页。